

转折与 新路

程中原 夏杏珍 著

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

1975年的文艺调整

国是怎样走上成功之路的

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之比较

1982：胡乔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卓著贡献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概括

历史的转折与新的打开

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转折 与 新路

程中原 夏杏珍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折与新路/程中原, 夏杏珍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170-707-9

I. 转… II. ①程…②夏… III. 改革开放—研究—中国—1976~2008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515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王树清
责任校对 郭 雪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66572155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印张 2 插页 31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一、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与 1975 年整顿

1

- 1973 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打倒的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位伟大人物，在 1975 年大刀阔斧地领导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四人帮”展开特殊的斗争。这一年成为努力从大乱走向大治的一年，成为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试验的一年，成为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二、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

——1975 年文艺调整述论

39

- 以评《海瑞罢官》引燃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艺事业造成了一场巨大灾难。1975 年，邓小平领导的文艺调整使荒芜沉寂的文艺园地苏醒过来，显露出生机与活力。
- 毛泽东三次发出为周扬平反的指示。
-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把揭露江青一伙扼杀电影《创业》的材料分别送给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
- 这一年继话剧《万水千山》的重演，又举办了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
- 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兴起，文艺调整就此中断。

三、周荣鑫与 1975 年教育整顿

70

- 周荣鑫领导的 1975 年教育整顿在新中国教育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 怎样认识和估计“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的教育工作，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 简单地把知识分子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错误的。
- 周荣鑫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说：“教育战线问题成堆，不向中央领导汇报，这样下去很危险。”
- 教育整顿终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周荣鑫在 1976 年 4 月被迫害致死。

四、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

——1976：从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

81

-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全国人民为失去总理而悲恸，为国家的前

途、民族的命运而担忧。

- “四人帮”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天安门广场成为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战场。
-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 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
-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

五、历史的转折与新路的打开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前后

105

- 从1976年到1984年8年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处在一个实现转折和打开新路的重要时期。
-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未能抓住开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机遇，提出“两个凡是”，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设置了障碍，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徘徊与曲折。
-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拨开迷雾、指明方向，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

六、邓小平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115

- 邓小平1977年再度复出以后，亲自领导教育战线率先进行拨乱反正，推倒“两个估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 1977年冬天，停止了10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全国570万青年报名参加了考试。全国共招新生27.3万人。

七、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

126

- 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 胡乔木在天津、上海调查时，接到通知，回到北京，邓小平同他谈起草讲话稿。
-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形势发生很好的变化，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突现出来，邓小平决定他的讲话稿要重起炉灶。
- 胡乔木起草的讲话文稿，忠实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又使得邓小平思想理论的表达臻于完美。

八、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141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遭到一些领导同志的指责。邓小平提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下禁令”、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
- 胡耀邦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明确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分清是非。
- 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

九、“二为”方向提出和贯彻的历史回顾

154

- 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预示着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新时期的到来。
- 邓小平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要发号施令”。“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要横加干涉”。
-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提出“双百”方针到“二为”方向，他们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制定了总方针、总政策。

十、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通过

161

-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前身；“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建国32年的历史作了一个完满的总结。
- 邓小平提出做历史决议的根本原则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 四千人大讨论规模空前，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进行的一次深入、具体的研究。

十一、在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199

- 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
- 邓小平说：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片言只语。

十二、陈云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独特贡献

217

-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禁令”，带头公开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副主席，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邓陈合作”为特点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 在历史转折时期，陈云表现出了令人感佩的历史主动精神，开阔的世界眼光、洞察事理的科学预见，冲锋陷阵、破除障碍的革命勇气，沉着冷静、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十三、1977—1982：胡乔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卓著贡献

235

- 胡乔木被邓小平称为“党内第一枝笔”。
- 邓小平复出，胡乔木再次充当参谋和助手。
- 胡乔木精心修改揭批“四人帮”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抵制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 胡乔木倡导按经济规律办事，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
- 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 协助邓小平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 在邓小平指导下，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创造。

十四、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比较

255

-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 两次历史转折，开辟了两条通向胜利的新道路，形成了两代领导集体，产生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世纪伟人。

十五、中国是怎样走上成功之路的？

266

- 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
-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始于毛而成于邓”。
- 中国的成功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走出来的。

十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

275

-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 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
-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 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

十七、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

293

- 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带领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 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
-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之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

一、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

197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它因邓小平主持各方面的整顿而闪耀着独具的、特殊的光辉。

这一年，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要津的“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九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1975年的整顿，成就卓著，深得人心。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1975年整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1975年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融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

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①他认为用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②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总算在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台湾省外，当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不想接踵而来又发生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被识破和粉碎。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林彪事件促使毛泽东醒悟，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进行了1972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③，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

可是，好景不长。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他们搞起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

^① 参见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1967年2月3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1969年4月1日）引用了这一段话。此报告1969年4月14日经九大通过，发表在4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② 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引用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一幕第四场中的台词。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第1版，第459页。

^③ 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指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

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又变得一片混乱。而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况。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钢产量比1973年下降410万吨。原煤产量下降400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5.3%，比1973年少运4321万吨。外贸逆差13.4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

“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萎缩，已经无法维持，已经再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了。制止动乱，进行整顿，成为“文革”九年动乱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促使1975年进行整顿的动因并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或愿望，而是涉及到整个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① 整顿在1975年进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是受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支配的，是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

毛泽东的醒悟与困惑

面对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引起的强烈社会动乱和国民经济严重下降的危险局面，毛泽东继林彪事件后又一次猛然醒悟。他顺应历史的潮流，做出了同整个民族、整个阶级，同广大群众的意愿相一致的决策。

其一，决心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毛泽东在武汉对今后全党全军工作的总方针做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的“八月指示”，中心思想是结束持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实现“安定团结”。表明了迅速结束“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的愿望。它的直接结果是把召开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上日程。

其二，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认识到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后做出的这一重要指示，周恩来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在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和“两步设想”的壮美蓝图，成为动员全国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巨大动力。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49页。

其三，批评“四人帮”，重用邓小平。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中国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邓小平“算一个壮丁”。^①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毛泽东对党、军队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做出了安排。毛泽东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许她插手“组阁”，并指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依靠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人事安排，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四个重要职务，执掌党政军的最高权力。这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组织保证。

同时也应该看到，毛泽东的醒悟并不完全彻底，他还有困惑，还存在着相当深刻的矛盾。首先，他虽然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希望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容许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局部的错误，同意甚至亲自下令在某些方面进行整顿，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容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他对“四人帮”虽然有很严肃的批评，提出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还是采取“一批二保”的态度。毛泽东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困惑以至迷悟，导致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复杂和艰难。邓小平出手的整顿措施，能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至少是容忍，关系到整顿的成败。邓小平同“四人帮”斗争的态势，直接关系到整顿的进展。诚然，在1975年，风云际会，邓小平站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领导整顿，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和作用，但应该看到，1975年整顿的胜利发展、巨大成功，以及它的骤然中断，都是各种力量矛盾斗争、交互作用的结果。

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先后做出并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把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在5月29日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②

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应该说，“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典范，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因为毛泽东的三

^① 1975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据胡乔木、邓力群编：《“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1975年本，第71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9页。

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干部群众共同一致的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经过九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混乱局面。从另一方面看，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物和对立面是“四人帮”。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以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进行，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四人帮”很难明目张胆地反对。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同时又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下进行的。邓小平依据“三项指示为纲”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重要理论：一个是“大局”论。强调周总理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和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①一个是“整体”论。强调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条。邓小平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明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工作重心，并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提供了批评的依据。邓小平对三项指示的总体把握，使1975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当的气势。

针对“四人帮”在贯彻理论问题指示中的极左观点和阴谋活动，邓小平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邓小平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②这就把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一起。邓小平强调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在1975年整顿中，他致力于运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搞资本主义的活动；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邓小平还敏锐地觉察“四人帮”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反经验主义”，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革命老干部的，是要把理论问题的学习变成一场有一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邓小平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办法，促使毛泽东清醒地制止了“四人帮”的这一图谋。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自5月下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迫使江青、王洪文做出书面检查，使他们再也不能借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来兴风作浪。而邓小平则通过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版，第4页。

② 邓小平1986年9月2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忆述1974年、1975年批驳“四人帮”观点时说的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71页。

这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同时，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工作，把整顿进一步推向前进。

为落实安定团结的指示，邓小平得心应手地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法律措施这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方面，强调把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同干部、群众直接见面，宣传动员要很深入，要做到家喻户晓；另一方面，有明确的政策，确定的期限，强硬的措施。邓小平从当时实际出发，为治乱安邦，横下一条心，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主要采取反对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落实政策、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打击破坏活动等重点措施进行整顿，只八九个月，就使一个动乱的中国逐渐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1975年整顿的发展过程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大刀阔斧地领导进行整顿。

（一）军队整顿的部署

早在林彪“九一三”外逃之前，毛泽东就已提出“军队要整顿”。此后，叶剑英按毛泽东的要求开始做军队整顿的准备。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刚开完，新任总参谋长邓小平即对军队整顿做出部署。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指出军队被林彪等搞得相当乱，好多优良传统丢了，军队臃肿不堪，要恢复优良传统，总人数要减少。针对闹派性和纪律很差这两个突出问题，邓小平提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①邓小平的讲话为部署军队整顿确定了指导思想，为六七月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做了思想准备。

会后第二天，叶剑英即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调整中央军委机构的建议。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为常务委员。此后，在叶剑英主持下，对编制、装备、科研、管理和干部等方面进一步进行调查研究，为军队整顿和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做了一系列充分的准备。

（二）整顿从铁路突破

邓小平做出了“军队要整顿”的部署之后，即着手进行工交战线的整顿。

197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指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页。

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搞上去。”这是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对当时国内形势分析研究的结果。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清醒地看到，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破坏，1974年工业生产的情况不好，影响全局的突出的薄弱环节是铁路。当时铁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生产下降。1974年全国铁路比1973年少运货物4321万吨，下降了5.3%。1975年头两个月未见好转，1月份全国铁路日装车量为45800车，2月份又呈下降趋势，只达到当时日装车能力55000车的80%。全国20个铁路局，15个没有完成运输计划。（2）事故惊人。1974年一年全路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0多起，比1973年增加48%，为10年前的8倍多。（3）规章制度不严，劳动纪律松弛。（4）堵塞严重，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行驶。情况特别严重的是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向塘、太原）。其中徐州的问题尤为突出。徐州地处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大干线的交会点。由于派性头头操纵的“批林批孔联络站”的破坏，1974年冬以来武斗再起，堵塞严重，处于半瘫痪状态，直接影响到华东以至全国铁路干线不能畅通。^①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跨越省区，贯通全国，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由于铁路运输不畅，大庆、克拉玛依等油田曾被迫部分关井停产；山西、黑龙江、安徽等省铁路沿线存煤500多万吨拉不出来，一些煤矿煤炭外运受阻，煤堆自燃，不能继续生产；缺煤使华东电网发电量减少三分之一，江苏、湖南等省有40%以上的工厂停产或大幅度减产，南方几省氮肥减产三分之一；昆明磷矿石运不出来，许多省市磷肥生产受到影响。显而易见，铁路运输这一突出的薄弱环节的问题不及时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国民经济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已经成为能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关键。邓小平抓住这个关键，下决心首先整顿铁路。

经过紧张准备，1975年2月25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简称“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星期在北京召开。经过与会者讨论，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1975年第9号文件），要求全国所有铁路单位必须贯彻“安定团结”方针，实行以铁道部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这个9号文件在3月5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的这天下发。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出席会议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全党要讲大局。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

^① 据工业书记会议文件之三：《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第4页。其中路局未完成计划情况据国家计委文件〔75〕计生字56号；2月份装车数据《铁路情况简报》第12期（1975年3月3日）。

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大局，全党要多讲。^①而当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关键，是解决铁路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方针是贯彻中央 9 号文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派性，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说，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他在讲话中点了徐州那个闹事的派头头的名，说“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他提出，要把铁路上和地方上搞派性的人之间的联系割断，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开，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要求解决问题不能拖，3 月份的动员要很深入，做到家喻户晓。^②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在会上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

3 月 6 日下午，铁道部即开大会传达中央决定和邓小平讲话。7 日晚召开全路电话会议传达。9 日，铁道部长万里到达徐州，在江苏省和徐州市党政领导的配合下，打了铁路整顿的第一场硬仗。

3 月 10 日，即召开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万人动员大会，万里出席讲话。同时，把制造武斗、严重破坏运输生产的坏头头顾炳华（徐州市物资局技术员）逮捕。江苏省革委会为此发布《通告》。11 日、13 日又接连召开徐州地区党员干部大会和徐州分局机务段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动员进行铁路整顿。万里还参加各种座谈会，宣讲、传达 9 号文件，使中央整顿铁路的决心和方针政策家喻户晓。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对派性进行旗帜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批判，对派性头头批评教育，坚决整顿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关心职工生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打击破坏铁路运输秩序的行为，克服有章不循和运输秩序混乱的状况。3 月 15 日又在徐州召集济南、上海、郑州三个铁路局领导干部会议，商讨解决津浦、陇海、京广三条干线不畅通的问题。万里在徐州领导整顿 12 天，雷厉风行而又扎实细致，使得徐州铁路枢纽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津浦、陇海两条干线畅通，徐州分局结束了连续 21 个月完不成运输任务的局面，4 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运输计划。

徐州铁路分局重点整顿的经验对全路整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铁道部在全路推广徐州经验，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贯彻 9 号文件。从 4 月到 6 月，万里先后到太原、郑州、南昌、长沙、株洲、昆明等老大难单位宣讲文件，发动群众，解决问题。在中央支持和地方配合下，果断地调整领导班子，对派性严重、不贯彻中央 9 号文件的领导干部有的撤职，有的调离。对闹派性严重而又坚持不改的坏头头，对违法犯罪分子，批斗了一批，逮捕了一批，还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者，有力地打击了破坏铁路运输的活动。经过整顿，到 4 月份，严重堵塞区段先后疏通，全国 20 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了计划。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2 版，第 4 页。

② 同上书，第 6—7 页。

日均装车达到 53700 辆，比 2 月份增加上万辆，为历史最好水平。部属 32 个铁路工厂，31 个超额完成计划。^① 初步实现了铁道部在整顿开始时提出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突出”（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两个不适应”（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做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王震赞扬铁道部领导小组是一个硬班子，指出 9 号文件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表明整顿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② 到 6 月底，全国铁路形势变化显著，安定团结局面逐步形成，一批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南昌铁路局 5、6 两月也都超额完成计划，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保持畅通，运输生产大幅度提高。上半年货运量完成 41607 万吨，为年度计划的 48.95%，比去年同期增长 8.6%，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在 20 个铁路局中，有 10 个局做到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③

（三）整顿在煤炭、钢铁行业展开

邓小平对工交战线的整顿抓得很紧。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之际，就抓住时机，在 3 月 25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运用徐州经验推动铁路整顿的深入和整个工交战线整顿的展开。刚从徐州回京的万里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提出，中央 9 号文件的精神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除体制外，也适用于各行各业。^④ 3 月 31 日晚，国家计委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出电话通知并印发工交、农林、国防工业各部，要求迅速把 9 号文件精神传达到整个工交战线广大干部群众中去，务必做到家喻户晓。要解决好领导班子的问题，促进安定团结，把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尽快搞上去。^⑤ 整顿工作遂在整个工交战线开展起来，生产形势很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煤炭生产本来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新成立的煤炭部领导决心打一场生产翻身仗。他们积极贯彻 9 号文件，一方面促进生产、运输好的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及东北各矿，让他们多产、多运；一方面敢于同派性作坚决的斗争，重点解决在全国煤炭产量中占重大份额的两省四矿（山东的枣庄、肥城、新汶，江苏的徐州）的问题，生产上得很快。4 月份洗精煤的日产量创造了全国历史最好水平。统配煤平均日产 754000 吨，比计划超产 19000 吨。^⑥ 整个工业生产也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原油一直稳产高产，月月超额完成任务。4 月份平均日产量 208000

① 据万里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1975 年 5 月 11 日）。

② 王震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5 年 3 月 28 日）。

③ 据铁道部档案处存《上半年铁路运输情况汇报提纲》（1975 年 7 月 22 日）。

④ 谷牧在全路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5 年 3 月 30 日）。

⑤ 国家计委 3 月 28 日给各省市区和印发工交各部委的电话稿，袁宝华 3 月 31 日签发。

⑥ 洗精煤为钢铁生产炼焦所需。山东、江苏四个矿洗精煤产量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占华东的一半以上。上钢、武钢、马钢、湘钢等所需洗精煤 40% 靠这四个矿。这四个矿的统配煤也占华东地区产量的 40%。